

淞沪会战研究的若干新面相*

——读何铭生著《上海 1937——扬子江上的斯大林格勒》

刘本森

2013年,《上海 1937——扬子江上的斯大林格勒》(以下简称《上海 1937》)一书在英美两国同时发行。^① 该书作者何铭生(Peter Harmsen),丹麦人,记者,大学学的是历史,现为法新社台湾分社社长,已在东亚地区从事报道工作 20 多年,其中在中国就达 11 年之久,曾采访大批中国的抗战老兵。有感于“在成百上千种关于二战的英文书单中,几乎看不到描写淞沪会战这场重要战役的著作”^②,他广泛搜集资料,完成了这部资料丰富、视角独特、可读性强的作品。

鉴于该书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色,也代表了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抗战的某些新认识和研究趋势,笔者不揣冒昧,简要介绍其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笔者对英文世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些认识和思考,以供国内抗日战争研究学界参考。

一、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普遍存在着所谓的“欧洲中心观”,具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则主要体现在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轻视中国抗战的地位和贡献等问题。例如,他们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是 1939 年 9 月 1 日,即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那一天。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如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在 2012 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将 1939 年 5 月发生在中国东北的诺门罕战役视为二战的开端,将 1945 年 8 月苏联进军中国东北视作战争的结束。^③ 这一观点无疑是对“欧洲中心观”的一大纠正。

《上海 1937》一书也有同样的纠正。例如,在淞沪会战的第一天中,66 岁的美国传教士弗兰克·罗林森(Frank Rawlinson)被炸身亡。对此,作者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他是在这一天的战争中丧生的四个美国人之一。他们在几分钟内先后丧生。他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第一批美国人。”^④很显然,作者是用委婉的方式批驳了二战开始于欧洲的观点,作者认为“1937 年的淞沪

*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与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Hans van de Ven)交流并承蒙其指教,特致谢忱!

①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Oxford: Casemate, 2013).

②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10.

③ Ant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2).

④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46.

会战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① 作者曾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一说法,改变欧洲读者眼中的“欧洲中心观”。^② 尽管他认为如果严格来说,二战变成真正的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下半年苏联和美国介入之后;他同时强调,如果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可以被当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标志,那么这一时间同样可以提前到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腹地。^③

《上海1937》一书不仅在界定二战开端上突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观”,该选题本身便是为改变西方学界二战史研究中不重视中国抗战史这一局面而进行的努力。该书一共310页,9章,以时间为序、战争进程为纲全面再现了淞沪会战。各章的主要内容分别是:

第一章“三具尸体”(7月7日到8月12日)。该章首先介绍了中日双方调查虹桥机场的三具尸体(两名日本士兵、一名中国士兵)事件;然后交代了战前上海的情况,上海的商贸发达、城市繁荣,但也充斥着性产业与犯罪,特别指出因为战乱频繁上海几度易手的情况;接下来讲述了1931年以来的中日双方关系、华北战场的战事、国民政府的部署与行动、中国陆军和空军力量、国民政府做出公开抵抗日本的决定;最后叙述了双方谈判解决虹桥机场事件的情况及双方军队进入上海。

第二章“黑色星期六”。本章主要讲述8月13日到15日间,中日双方的计划、作战安排、每日战况,同时也交代了战争下租界内外国人的生活。该章提到了战争之初德国顾问的乐观态度,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对“经过认真训练和装备良好的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非常有信心”^④,并向英国外交官表示“如果他们听从德国顾问的建议,他们将有能力把日军赶回长城之外”。^⑤ 作者指出,在这一观点影响下,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采取了强硬的进攻作战方式,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

第三章“血肉之躯对抗铁甲战车”。本章主要叙述8月16日到22日中日双方的战况,战斗描写中突出了日方的装备占优,而中国军队的牺牲精神很强。该章重点描写了在中国军队中担任顾问的德国人。作者指出,“铁拳行动(Operation Iron Fist)是德国顾问在淞沪会战初期的主要贡献”,但是他们的贡献又不只如此,“他们既出现在参谋部里,也出现在战争前线”,并且,他们的身份“并不是秘密的,甚至报纸上有频繁的报道”。“他们身穿蒋介石军队的制服,不仅给中国军队提供战术支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他们的存在使中国士兵认识到他们不是在独力抵抗强大而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⑥

第四章“万岁!万岁!万岁!”。本章主要讲述8月23日到9月10日间的战况。日军将领松井石根率领两个师团增援,在川沙口等处登陆,日军飞机也连日轰炸。中国军队以极大的牺牲精神进行防御,死守罗店和宝山,付出了沉重代价,部队减员非常严重。作者通过一位中国士兵之口说,尽管中国军队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补充兵员”,但由于长途跋涉、缺乏实战经验等因素,新兵战斗力低下,“在装备优良的日军面前,只能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⑦ 此外,该章还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①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9.

② “Publication’s Q&A with the book’s author Peter Harmsen”, *Taiwan Today*, July 2013, 转引自作者关于该书的博文 <http://www.shanghai1937.com/q-a-with-author/>, 2014年6月23日。

③ “Publication’s Q&A with the book’s author Peter Harmsen”, *Taiwan Today*, July 2013, 转引自作者关于该书的博文 <http://www.shanghai1937.com/q-a-with-author/>, 2014年6月23日。

④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p. 50 - 51.

⑤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51.

⑥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75.

⑦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p. 115 - 116.

例如,日军血洗了罗店附近的韩家宅村,全村只活下来一位老太太和一个12岁的男孩。^①

第五章“血流成河”(9月11日到30日)。随着战况日益惨烈,士兵的鲜血染红了吴淞江。本章通过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的活动侧面描写了战况。作者指出中国的抗战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的认识,为中国赢得了声望和尊重。^②本章还描述了空战、中国战略的改变、日本战略改变等。作者也描写了租界内的生活。在租界外血流成河的同时,租界里的“外国人假装战争并不存在”,足球协会每年一度的比赛照常举行,商店也挂着“照常营业”的牌子,但是战争的影响肯定存在,“出于安全考虑,人们更喜欢待在家里”,于是,剧院里座位只坐满了三分之二,中秋节庆祝取消了,婚礼仪式简化了,难民越来越多。^③

第六章“东方凡尔登”(10月1日到23日)。日军发动新的攻击,不管是坚守战场已久的中央军,还是远道而来的川军、桂军,都浴血奋战,牺牲巨大。文章通过外国记者、日本军官和士兵等视角反映了中国士兵的英勇。本章描写了日本士兵残暴杀害中国人的情况,例如,有个日本士兵发现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走在路上,边走边喃喃自语,“更多的士兵围了上来,讨论该如何处置她,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讨论:‘我去杀了她’”,他手里拿了一把刀,“没有任何犹豫,走向那位老妇,喊了声‘哎,你!’,老妇一转身,他把刀插进了她的胸膛”。^④作者指出,由于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的残暴表现,国际舆论大多站在中国这一边。^⑤

第七章“四行孤军”(10月24日到11月4日)。本章介绍中国军队撤退,留下一小支部队在四行仓库掩护的史实,分别讲述了决定的做出、日军占领大场、中国的撤军、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杨惠敏送国旗、战争中的医疗情况、税警总团的抵抗、日本战略等。关于会战期间的中方医疗情况,作者指出,淞沪会战中伤员的“存活比例约为55%”,这比抗战时期其他战场的存活率要高,这得益于上海的医疗条件出色。^⑥在讲述税警总团在苏州河抵抗日军时,作者认为“根据德国顾问的说法,中国军队屡次犯下同样的错误”,他指出,“中国下层军官缺乏独立思考制约了他们及时对日军行动作出有力反应”。^⑦

第八章“陷落”(11月5日到11日)。本章讲述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德国顾问的建议、中国将领的判断和决定、中国军队的撤退等史实。中国军队在撤退中损失惨重,这引起德国顾问的不满,他们认为:“撤退是一种军事选择”,而中国军队的领导者并没有这样的认识。^⑧在缺乏统筹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的撤离如同溃败。

第九章“尾声”。本章讲述了上海遭受的巨大破坏,分析了中国军队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作者还指出了两点:第一,“淞沪会战是日俄战争以来亚洲最残酷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⑨第二,“德国人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关键作用体现在“中国的每一个主要部门都至少有一位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观点极大影响了蒋介石在上海进行一次大会战的战略决定,同时也对会战时中国的战术选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坚守罗店和以夜战为主的

①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107.

②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139.

③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p. 149 - 150.

④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165.

⑤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181.

⑥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206.

⑦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214.

⑧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224.

⑨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247.

主张,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行动相符”。^① 作者同时指出,随着战役的进行,“德国顾问发现他们的影响在逐步降低,蒋介石和中国指挥官忽视他们的意见。当德国顾问提出对日本防线薄弱区域进行突然袭击、在日军登陆部队建好牢固工事前组织快速反应部队进行攻击等建议时,中方没有听取”。^②

此外,该书收录 73 张照片,内容以中日双方士兵为主,展现了士兵在战斗过程中和生活中的场景。照片非常清晰,读者甚至可以通过照片中人物的面部表情捕捉其内心反应。

二、研究特色

众所周知,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场重要战役。淞沪会战研究是一个成果丰硕的研究领域,会战结束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对这场战役的检讨与研究。^③ 面对研究成果丰富的老课题,如何能写出特色?《上海 1937》的作者在该书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第一个特色是视角的多维性。就目前的学术标准而言,一部出色的抗日战争史研究著作,一般都需要对照使用多国档案,利用不同视角再现史实。近年来,西方学界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的新作,大都体现出资料丰富与视角多维的特点,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穆尔(Aaron William Moore)的《记录战争:士兵笔下的日本帝国》一书,使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抗战时期中国、日本、美国士兵的日记、书信、明信片 and 回忆录。作者通过士兵书信和日记这一视角,从士兵的角度还原了国家话语、大众传媒和军队如何影响他们对战争的认识。这种搜集和运用史料的做法别具一格。^④

《上海 1937》一书在史料搜集和视角驾驭上也有独到之处。为了全面反映这场战争,作者搜集了四部分史料:一是中方资料,包括抗战时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层的日记和回忆录、报纸、当地人的记录和参战老兵的口述资料等;二是日方史料,包括日本政府的作战计划、日军参战者的日记、报纸、照片等;三是上海租界内欧美人士的相关资料,包括欧美记者的报道,居民的回忆录、信件、照片等;四是在中国军队中的德国顾问的资料,如回忆录、书信等。^⑤

资料来源的多样性有效支撑了作者采取中方、日方、上海租界和德国顾问四个视点交错的方式描述战争。从淞沪会战的起因、日军的行动、蒋介石的决策、中国军队的主动出击,直到战事的胶着、上海的沦陷,以及战争中租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遭遇等等,淞沪会战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面相都在四个交错互补的视点中完整地呈现出来。作者在每一章的写作过程中,都会描述中日双方军官和士兵的经历与感受、百姓的苦难、西方人士的遭遇及其眼中的战争、德国顾问与战争,力图呈现一幅全面、多维、客观的战争图景。在上述四个视角中,以往研究最常忽视的是德国顾问。作者指出,正是因为他们他们在淞沪会战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日本人甚至将这场战争称为“德国战争”(German War)。^⑥ 此外,书中从日方视角进行的描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推翻了以前的日本士兵都会

①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249.

②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250.

③ 王喆:《“八一三”淞沪会战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

④ Aaron William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Introduction, pp. 1-3.

⑤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p. 293-302.

⑥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75.

血战至死的观点,指出日本士兵也会临阵脱逃、举旗投降,文章也描写了日本士兵在战场下的生活,比如爱看小说、写日记、拍照等。^①通过这种多视点交错描述方式,该书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更为丰满的淞沪会战,同时也告诉我们:资料的丰富性、视角的多维性,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认识的片面性。

第二个特色是将这场会战赋予新意义:城市战的开始。作者在该书序言第一句就写下了这样的话:“在1937年初之前,‘城市战’对世人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今年秋天在上海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战役改变了这一切。”^②作者指出淞沪会战是现代“城市战”的开端,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场景实际上五年前就已经在上海出现过了,所以他给本书起的副题是“扬子江上的斯大林格勒”。他认为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主力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对抗战局势影响巨大,虽然时间上只有三个月,但战况的混乱、惨烈、伤亡、破坏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以后的一些著名战役,况且战役发生在人口稠密的上海市区,是现代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战役。

对于新意义的发掘和新概念的提出,西方学者更富于敏感性。如美国学者 Franco David Macri 在其新著《帝国在华南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 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中提出了“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的概念。代理人战争,指的是中国在抗战前期扮演了同盟国代理人的角色与日本作战。该书把中国抗战置于全球格局下,探讨了1941年太平洋战场开辟之前,为使日军陷于中国南方的战事而无暇侵略西伯利亚和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盟国支持国民政府在中国南方(主要是湖南和广东)抵抗日本的史实。^③类似这种新意义的赋予和新概念的提出,本身就代表着新发现的产生。

第三个特色是小人物的灾难史。《上海1937》一书善于从小人物入手,利用他们的日记和书信,描述在小人物眼中战争如何展开和发展,如何影响他们的精神和生活。如书中的第二章“黑色星期六”,作者从在上海生活了35年的外国传教士弗兰克·罗林森的视角展开,描述了他经历的这一天,如何从寻常变成了不寻常。这一点比许多中文研究作品新颖,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回避了研究较为充分的战争过程,将目光聚集在战争中的百姓身上,讲述战争如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百姓面对轰炸如何反应和救援,城市医疗如何作为。^④这一章,写出了战争中的人的情感,是在写战争中有血有肉的“人”。在第三章里,作者描绘了战争下的百姓的精神恐慌和悲惨命运,如他们听信并传播日本人向井里投毒的谣言,毒打甚至杀害携带粉末状物品或药品的无辜同胞^⑤;再如上海北部靠近战区的百姓逃到租界,却因抢夺食物而被处死。^⑥该书不仅有百姓的灾难史,还讲述了一些普通士兵的命运和对战争的感受,例如第四章里,通过一名中国士兵之口讲述前线士兵的思想状态,他们如何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下保持战斗精神。^⑦整本书中,作者直接描写战场的时候不是特别多,但是这种“跳出战争写战争”的写法却又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战争的惨烈,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灾难。

①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p. 85 - 87.

②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9.

③ Franco David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 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 - 1941*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2012).

④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p. 57 - 62.

⑤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80.

⑥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80.

⑦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p. 99 - 102, 124 - 126.

上述特色使《上海 1937》成为一部新颖且饱满的优秀史学著作,给读者提供了鲜活的现场感,也不乏新意义的阐发。不过,作者身为记者的职业特点,使其在史料考证、观点论证方面的诠释方面稍显不足。然而,这一不足避免了该书的晦涩与枯燥,谁又能知道这是一种不足还是一种成功?

三、思考:抗战史如何走向世界

何铭生认为对中国抗战的研究在西方学界还是“一个巨大的空白”。^①对这种“巨大的空白”,英国牛津大学米德(Rana Mitter)教授在其新著《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生存而战(1937—1945)》中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的抗战史从我们的记忆中褪色了?我们应该如何唤醒它?”^②这或许也是中国学者正在思考的问题。

《上海 1937》无疑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者选择了西方人相对熟悉和感兴趣的题目,将目光聚焦在战争下不同的人,叙述流畅动人,以生动的文笔讲述了一场惨烈的战争、一批壮烈的勇士以及一些不幸的百姓的故事,同时不乏独到见解,将会战赋予了现代“城市战”的开端这一新意义。这一切,都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唤醒记忆并给人以启迪。

这似乎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抗战史的某种趋势。他们希望讲述可读性强的故事,通过描述战争和战争下的难民、妇女、生产生活、革命,展现中国人民的痛苦或者面对灾难时的生存与勇气。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灾难史和受害者形象是近年来西方抗战史的主要研究基调之一。比如米德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生存而战(1937—1945)》将这段历史描述成“灾难史”,将中国定义为“被遗忘的盟友”,凸显了中国的弱者形象^③;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苦海:中日战争中的难民》关注了抗战时期的浙江难民^④;Diana Lary的《战争下的中国人:人的苦难和社会的转型(1937—1945)》关注了战争下无家可归的难民及其与疾病和饥饿的斗争。^⑤2012年底《欧洲东亚研究杂志》出版了一期名为《战时中国的福利、救济和重建》的专刊,7篇论文的目光分别聚焦在妇女、童工、疾病、救济、社会安全和战后重建上^⑥;在西方,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它们不同于以往的战史研究,而是将目光放在了战争本身以外的地方。诚然,抗战史不仅仅是战史、军史,也是社会史、生活史,不仅仅是英雄史,也是小人物的历史。这种研究取向有值得借鉴之处。

然而,西方学界在强调抗战时期中国的受害者形象这一过程中,势必会导致对某些方面的忽视。诚然,对灾难本身的研究非常重要,然而,中国的上层和民族主义者如何组织战争、如何思考中国前途并致力于改变中国命运,是不是也值得关注?具体到《上海 1937》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致力于讲述一个悲壮动人的故事,故事的细节很饱满,特点很明显。然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什么发起淞沪会战,为什么要将战事引向中国东南?他们希望通过一次次战役达到什么目的?国民

① Peter Harn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 11.

②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 - 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Allen Lane, 2013), p. 11. 该书在美国出版时,名为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 - 1945*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③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 - 1945*, Prologue, pp. 1 - 14.

④ R. Keith Schoppa,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⑤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 - 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⑥ Rana Mitter and Helen Schneider (eds.), 'Welfar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in Wartime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Special Edition), Volum 11 number 2, Dec. 2012.

政府通过抗战组织撤离、保存实力,以便日后实现重建和现代化的活动在战争中如何体现?这就需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图、战场之外的行动等进行解读。然而,书中却缺乏对这些的充分介绍与说明。

米德在其著作中指出:“几十年来,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都没有给中国一个正确的定位”。^①然而,正确的定位并非是通过灾难史的描述就能实现的,这样只能将中国定位在受害者的形象中。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教授曾提出:今后要“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国地位确立中的重要意义”,要开展“适应中国国际地位”的“共同研究”。^②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向。共同研究的手段和目标不应该只停留在灾难史构建或证明的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在灾难、抗争、革命、人物活动等领域之外,就中国的抗战与重建、中国战场与世界战场的关系、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等研究内容上,与西方学界做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界抗战史研究中灾难史、社会救助史、生活史研究趋势是近年来史学界研究趋势的一个缩影。陈启能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这体现“在对史家与史料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上,历史认识的对象和方法上,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内容上,历史知识的叙述形式上,以及历史文本的解释上”。^③如在“历史认识的对象和方法”上,他们强调“新”,强调突破旧题材,其表现之一就是某一领域中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研究大热,这在抗战史研究也有反应,即强调战时文化、灾难、救助、生活等方面。不仅西方学界如此,受其影响的中国学界也存在这一现象。毋庸置疑,这些研究让历史更丰满、更贴近那个时代的生活,然而,对很多研究领域来说,也还有更为宏观、意义更重大的层面需要关注。

无论如何,《上海1937》作为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体现了西方在该领域的研究新动向。对于这些动向,我们不管是抱着学习借鉴还是批判的态度,都需要首先了解和认识它们,这也是笔者不揣冒昧对其进行介绍的旨趣所在。

[作者刘本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p. 5.

② 步平:《关于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思考——以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人民日报》,2010年9月3日,第7版。

③ 陈启能:《二战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